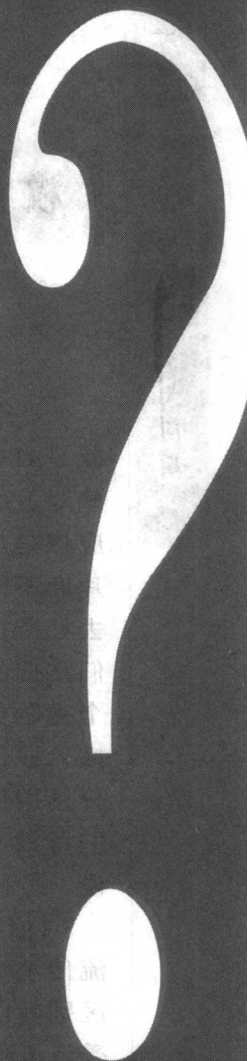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什么是历史

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关于其他社会、其他信仰和其他时代的知识，从而使我们更能宽容我们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差异。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民主、公民化的教育，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理查德·J·埃文斯
英国学者



权威解读

理查德·J·埃文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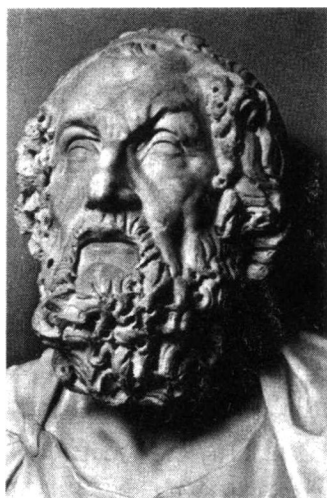
剑桥大学 近代史教授

“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非常明显：历史就是对过去的研究。然而，事实是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有些对过去的研究方式并不能被归入历史的范畴。历史首先应该是从过去事件中发现真理的研究。与小说家或电影制片商不同，历史学家不会去制造从未发生的事件，也不会去杜撰什么从不存在的人物。剧作家和影视编剧可以对他们掌握的原始材料进行大胆的处理，使来源于过去的某一个主题更加生动有趣。他们可以虚构对话，在历史资料中插入原作中没有的东西，以一种不受史实约束的方式，充分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历史学家们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们要面对事实，而非虚构小说。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第一部严肃的历史文献巨著，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从那时开始，历史和小说之间的区别就已经被所有的历史学家所确立。作者修昔底德不接受诗人们传播下来的有着浪漫色彩的神话，就像他告诉读者的那样，要“尽可能彻底地”检验所有的证据。但正如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经常会做的那样，他接着又开始抱怨，发掘事实是多么难，他说：“不同的当事人对相同的事件给出的叙述是不同的，部分站在这个立场，部分站在

那个立场，而有时则只是一些破碎的回忆。”

在修昔底德的伟大著作诞生以后的大约2500年间，历史学家们精心制订了许多完整的方法，用以检验证据和对付它们的偏颇与差异。但他们从未能对整个事件取得近乎真实的或完整的了解。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对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留传给后人的遗迹遗物的接触中，提出可能性叙述，尽管有些令人信服，有些不能令人信服，有些则几乎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荷马，古希腊最著名的诗人。

历史仅仅涉及关于过去中可知的一部分，因为除了对事实的探索之外，它还有一个基本的任务：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重建和重现过去，而且还在于理解和诠释过去。这是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之处，后者只是阐述年份、标出事件，而并不去将它们联系起来，或试着解释它们发生的原因。

解释和诠释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也使得它对过去的处理与宗教、道德伦理和法律有所不同。宗教通过先知和圣徒们从远古传下来的神圣篇章寻求正统。然而，从史学角度来处理这些篇章，则意味着要把其中的神圣性撇在一边，并对它们提出质疑，就像人们会对其他史学材料提出质疑一样，这是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运用的最有力的一个程序。

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关注的是对有罪或无罪的判断，以及把行为责任区分为好或坏、合法或违法。这些同样也是非史学性的处理方式。近来开始流行把历史人物按时代归类，如第三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或者欧洲人在澳洲定居，所采用的是源自道德伦理和法律的术语，诸如“罪

犯”、“受害者”、“旁观者”、“勾引者”等，并据此分别给予赞扬和责难。这与历史的内在宗旨有着深刻的差异。历史首先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关心的是原因、结果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对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作出傲慢自大的判决，像个事后诸葛亮。

当然，历史学家可能做到，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有义务提供原始材料、证据或背景陈述，以帮助一些机构，比如战争罪行判决法庭或委员会，针对法律承认的历史错误的赔偿要求进行评估。这与作为他们工作的另一方面——写出以前未出版过的学术著作同样重要。但是，这种对专家意见的借鉴，无论如何必要，并非历史学家的主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解释，而判断则是其他人的事。

这就是说，除了其他事情，历史学家不得不试着以尽量宽广和多样化的观点来理解过去，不能以某个或某组特定的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更不能超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关注热点来排他性地研究历史。纯粹为了满足现实的某种利益，如为了鼓励民族自豪感，证明一个种族或民族群体受到了另一个种族或民族的几代人的压迫而写出的历史，就完全可能退化为宣传工具，除非它愿意接受事实的检验，并当其与历史学家的目的相悖时服从于事实。

与此同时，历史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基于当代理论而形成的主观臆测，以及通过对史实的彻底回顾而对之提出的批评性检验。历史学家们对过去变革的透视，不仅带着不断增长的时间差距，而且还带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不断变化的理念，以及历史学家所处的社会和知识界所关注的焦点、方法和思想。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历史的范畴不断稳固增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历史惟一或主要关心的是国王和战斗、政治和外交、“伟人”和伟大的战争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在21世纪，任何东西都被放在了历史学家碾米厂的碾子上。

历史所涉及的大问题囊括了私人和公众的生活、理念和信仰、个人的举止，甚至诸如环境、地理和自然世界这样广阔的主题。你可以向他们询问世界各地，以及过去的



帕特嫩神殿遗迹，位于雅典卫城，公元前432年建成，此时正是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期。

任何一个时代。附加条件只有一个：只要对这些领域采取的调查研究完全出于寻找一个“大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为了本身的事实和知识的单纯积累。如果是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将其归入好古癖的麾下。

当然，历史学家之间对几乎所有的这些观点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大多数针对有关过去的大问题，他们在当时和另一时间所提出的答案的态度是一样的。争论是推进深入了解历史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就像粗糙的边缘消除了不太真实的或夸张的解释，或者有理的辩论将无根据的胡搅蛮缠推入不能让人相信的主观臆测的垃圾箱。历史学家之间普遍存在争论，这一现象正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如下的声称是错误的：“历史将审判、赦免他们，或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护。”历史学家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作出这种声明，无论是关于古巴革命的还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接受的训练，使他们可能持着有益的怀疑主义，以戳穿某些政治家和治国者们的狂野宣言。它可以、或应该帮助任何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在看到一个骗局时识别它，并在接受一个说法之前要求有清晰的证据。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对于遗产的多种工作来说是基础训

练，而且远比现今的制造业产生更高的国家收入，在更加宽广的文化、旅游和艺术领域中得到的出口收益更加明显。历史书籍、电视转播、无线电广播、报刊文章和其他文化产品从未产生过如此的优势。在这个大的层面上来说，历史是一台主要的国家经济赢利机器。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关于其他社会、其他信仰和其他时代的知识，从而使我们更能宽容我们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差异。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民主、公民化的教育，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延伸阅读

大卫·坎那丁（编辑）：《历史现在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Now?），帕尔格莱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01年。

E·H·卡尔：《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1961年，40周年版，有理查德·J·埃文斯的介绍，帕尔格莱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01年。

G·R·埃尔顿：《历史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悉尼，1967年，第二版，有理查德·J·埃文斯的编后记，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理查德·J·埃文斯：《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1997年，答复评论家们的第二版，格兰塔出版社，2001年；《关于希特勒的谎言》，威索出版社，2002年。

深度评析

哈里特·斯万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副主编

1961年，E·H·卡尔在他的散文集《什么是历史》中提出了这个最著名的问题。当然，他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宣称，历史是为了保持对希腊人和巴比伦人所做的事情的记忆，“而且，它超出其他任何事情，特别是为了给出他们相互之间的战争的原因。”从那时起，历史学家们就一直在思考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希罗多德的继承者们几乎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历史是对于重大事件——特别是那些牵扯到战争事件的纪念，以及对它们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尽管还有其他理念，但这一理念却一直流传至今。自希罗多德以来，历史学家们曾提出了许多对历史的定义，从过去所真正发生的事件，到皇家爱情生活在电视中的重现。

然而，史学的研究相对来说是在近期开始的，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有时是有争议的。历史学家们是不是应该花力气在解释过去，而不是对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感到痛苦呢？如果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分析历史上，而不是写历史上，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对“历史究竟是什么”发表权威性的见解呢？

对于许多早期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就简单多了。历史



希罗多德双面像。希罗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

无疑是关于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神圣的希伯来篇章不断地回顾过去，以识别在特殊事件中的“上帝之手”，早期的基督教作品也一样。圣·奥古斯丁，是四世纪时最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他以描写“神圣历史”而出名，他在《上帝之城》中，把历史的愿境描绘成上帝意志的展开，这个观点影响了西方史学长达几百年。

宗教也激励了早期的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他们渴望对先知的生活做出精确和详尽的记述，这就特别强调历史素材的真实性。这是十四世纪的伊斯兰教学者伊本·卡尔顿所专注的事情之一。他对未来东西方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世界史论著《摩加狄马》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对与历史发展相关联的心理、经济、环境和社会力量进行了研究。他还较早地醉心于通过古今对比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1469—1527）的政治哲学有些是与卡尔顿的历史研究相关联的，而对古代篇章进行研究，并饶有兴致地发表权威性的意见，则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诸如马基雅弗利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思考历史的方法在古典时代就明确地形成了。马基雅弗利遵循经典作者的信条，即：历史应该为道德伦理提供指南，并应该采用一种有劝导性的和带修辞色彩的风格来达到这个目的。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坚持，历史的目的在于探求道

德伦理。这种理念抛弃了上帝是人类活动的先知这样的思想，从整体上说，倾向于讨论理由。现在，人们更强调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中所得出的知识，而不是先验证。这就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所开发的哲学，它奠定了以后统治历史研究200年的“经验主义”基础。这一“科学的”历史观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特最紧密相关，他试图识别统治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广泛法则。他把他的哲学叫做“实验主义”，以强调其与“真实”的数据之间的联系。

利奥帕尔德·冯·伦克（1795—1886）是追求历史客观事实的代表性历史学家，感谢他揭示了按实际发生来写历史的意图。这种研究方法究竟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是以后一直谈论的问题。事实上，它在伦克的时代十分流行，而像托马斯·巴顿·迈考利（1800—1859）和托马斯·卡莱利（1795—1881）这样的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还强调在他们的职业中，应具有文学方面的素养。对于迈考利来说，事实“只是历史的渣滓”。第一个有意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是意大利思想家贝尼德托·克洛斯（1866—1952）。他表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東西。爭辯就像一个大車輪隆隆向前。

20世紀初，J·B·伯利在劍橋大學的就職演說中宣稱：“歷史是一門科學，仅此而已。”而R·G·考林伍德在其1945年出版的《歷史的理念》中這樣回應克洛斯：“歷史是歷史學家在其頭腦中，對他所研究的歷史思想的再一次上演。”¹ 卡爾的《歷史是什麼》（1961），堅持我們從未獲得過“純粹的”歷史事實，因為它們沒有也不可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他們總是要通過記錄者頭腦的折射。1967年，另一位劍橋學者G·R·埃爾頓在《歷史的做法》中為歷史的自我控制和職業歷史學家的重要性進行爭辯，他說：“他們是帶著放大鏡爬行在知識的前沿的人。”

同時，在法國，米歇爾·福考特、羅蘭·巴蒂斯和傑克·德利達正在為後現代主義鋪平道路，他們對真理與決定真理的權力體系之間的聯繫，以及歷史篇章的重要性提

出质疑。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海顿·怀特将历史形容为：“口头的小说，其内容与其说是发现出来的，还不如说是发明出来的。”所有这些观点在以后的200年中都传到了英国，其间，阿伦·孟斯洛创建的期刊《历史的反思》和凯思·詹金斯的一个同名书籍争辩说，“历史主要是历史学家们写出来的”，“是一种可转移的、有问题的记录”。理查德·J·埃文斯所著的该书的姊妹篇《捍卫历史》（1997）继续了这场争论。埃文斯在该书中对詹金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总结道：“它的确发生了，而且，如果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并抱着自我批评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它是如何发生的，并对于它意味着什么得出一些虽然不能完全说是最终的，但也是站得住脚的结论。”

关于历史该如何研究就说到这儿。长期以来，该如何研究历史，这个理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仅有的奇怪的例外，就是像卡尔顿以及后来18世纪的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如果历史是为了提供一些道德伦理和宗教的指南，并树立一些遵循的榜样，那么，伟大的事件和参与它们的伟人就肯定是它应该关注的。“战争，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历史的基本主题。”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伦克来说，政治和外交是值得他找寻客观事实的惟一地方。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决定性地转移了历史研究的重心。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宣称：“所有迄今为止所存在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对历史的阐释，即：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历史的推动力是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所以，人类的经济关系是历史的核心。这有助于确立“谁”和“什么”被视作历史研究的合适的对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普通平民在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就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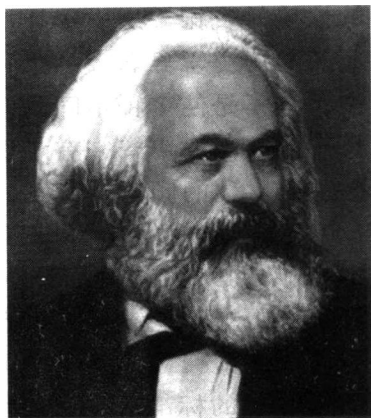
马克思对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有着特别的影响，该学派得名于法国路西安·菲伯夫和马克·布劳克于1929年所创立的同名期刊。他们强调社会、经济、文化，甚至地理的力量以及后来的大脑结构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他们的目

标是“完全历史”，涵盖社会的所有方面。后来的年鉴派作家利用计算机资源，也十分强调数据在探索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问题的重要性。

如今，计算机正改变着历史研究的方法。超链接意味着不带一丝历史信息的历史成为可能，使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容易成为自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这对诸如遗产和家谱之类的历史分支学科的流行做出了贡献，而这些是职业历史学家们不会关注的。它还对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体现就是像丹尼尔·沃夫的《过去的社会循环：英国历史文化 1500—1730 年》（2003）之类的著作，关注的是除了历史学家以外的人们对过去历史著作的影响；或者是理查德·普莱斯的《阿拉比的世界》（1990），它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奴隶后裔的叙述、殖民地报道和传教士日记编织起来。

后现代主义不仅提出了用文化型历史来替代社会和经济分析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整体上粉碎了主流概念，从而使历史有了许多不同的种类。口头历史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从而引发了对记忆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考量。其他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包括历史表现理念，正如格雷格·丹宁所描述的：“作者最值得创造的效果是……有一个有创意的读者。我们不得不激起纷争、打造评论家、让他们加入到交流中来……我们需要表演我们的主题。”或者说历史是电影。

1998年，罗伯特·罗森斯通在《过去的愿境：电影对我们历史概念的挑战》中表述道，历史题材的影片是不应该从历史的精确性方面对其进行评判的，因为电影的本质使得精确成为不可能，而应该注重它们对过去所未有过



卡尔·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的情境的发掘。历史影片把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和最近兴起的对历史学界名人的顶礼膜拜不无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不是使多种不同的言论并存成为可能，而是可能让单一的武断的声音来有意识地引导观察者，并对过去产生一种个人化的倾向。

关于历史的观点从来就不是直截了当的。在《历史的本质》（1970）中，亚瑟·马威克这样说道，“历史作品反映的历史不能被切成整齐的几个部分……在任何时候都有人大声嚷嚷着，反对把保守的编年史中的正统部分作为那个时代的标准。”在较为近期，埃文斯把这个领域描述为“重写”。即使是对于那些相信有可能对历史所关心的问题做出肯定答案的人，“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也通常被证实是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尽管他们相信它从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他们却不可能不问这个问题。

第二章 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导者

如果你发现你的谋士关心他自己比关心你更多，他决不会是一位好的谋士……为了使自己的谋士保持好的状态，君主应该体贴谋士，尊重他，使他富有，借给他钱，给他一些荣誉和职责，以便使谋士意识到如果没有君主，他就不可能生活下去。

——马基雅弗利
意大利政治家



权威解读

布兰登·赛姆斯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讲师

皮特豪斯学院历史系 职员

自古以来，人们就热衷于埋头在历史中，孜孜寻求关于领导艺术的启迪。到现在情况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从最世俗的层面来说，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都越来越多的倾向于从历史上伟大的领导者那里获得启发。许多自助手册，如《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一世：无所畏惧，来自于一个王国缔造者的战略启迪》，《伟大的战略艺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导艺术启迪》，《伟大帝国缔造者的启迪》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在政界高层的显贵世界中，寻求历史启迪和激励的做法更是备受推崇。例如，在尼尔·弗格森的《帝国：大英帝国如何创造了现代世界》的美国版本中，就描述了普遍适用的领导艺术。同样，战略历史学家埃利奥特·科恩创作了《最高命令：战争时期的士兵、政治家和领导者》一书，此书受到乔治·布什总统的推荐，并于2001年“9·11”事件后在白宫内大量复印和散发。当乔治·布什总统面临21世纪恐怖主义的挑战时，科恩关于亚伯拉罕·林肯、温斯顿·丘吉尔和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领导艺术的著述，将会期望给布什总统带来类似的启迪和激励。

在所有关于领导艺术的例子中，温斯顿·丘吉尔堪称不

朽的典范。他关于纳粹威胁即将出现的精确预见力，在面对二战初期逆境所表现出的坚韧力和豁达开朗的性格，以及对英国民众的情感号召力，都使他成为今天政治家们无法抵挡和忽略的榜样。因此，当人们发现托尼·布莱尔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强硬姿态中带有明显的丘吉尔作风时便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布莱尔在国会的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曾经把时局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并拿自己和丘吉尔做过含蓄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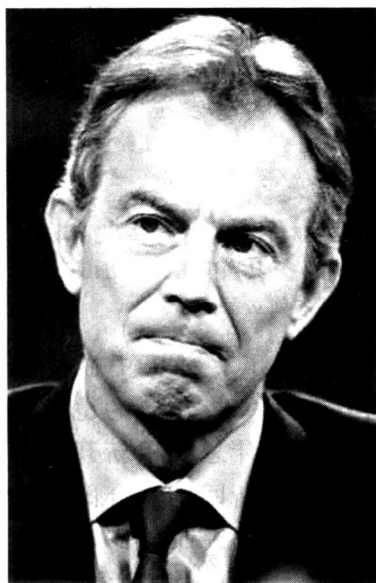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国的创立者。

毋庸置疑，在整个伊拉克危机中，布莱尔在领导能力方面展现了一种历史性的品质。在全球范围内，他向伊拉克派驻了一支重要的也是最先进的部队。他在联合国安理会说服布什总统重新开始中东和平进程，并在后来提议让伊拉克重新回到联合国。在欧洲，布莱尔使英国从一个由法国和德国控制的少数派中解脱出来，转而带领九个欧洲国家走上了更加亲美的道路。在国内，布莱尔通过采取施加压力、巧言诡辩和激烈雄辩平息了国会的反对之声。

这已不是布莱尔第一次显示如此果断的领导才能。在他决定与北爱尔兰新芬党举行无条件会谈，以及在许诺以后不进行重压和报复的基础上，说服厄尔斯特联合党保持对话，在这些谈判中，他的才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结果是在1998年耶稣受难节那一天，协议签订的仪式上，布莱尔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说，他说他感觉到自己肩膀上搭有“历史之手”。也许布莱尔领导才能的最佳体现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斯洛布登·米洛舍维奇的

统治被推翻，他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人都失去了冷静，而布莱尔则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与他的前任约翰·梅杰首相的保守和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把布莱尔与丘吉尔进行比较的时候，不应该怀疑现任首相具有应付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危机的挑战的能力，不应怀疑布莱尔是否具有温斯顿·伊恩那样超凡的感召力，也不应否认他传达给国民的，就像丘吉尔曾经领导他的民众所做的那样，现在已经别无选择的坚定信心。在伊拉克问题上，布莱尔把英国民众、白宫以及军队领到了一个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



托尼·布莱尔，英国首相。

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成就更大，而且相当不同凡响。毕竟领导才能不能从逻辑关联中简单推求。就像卡尔·马克思提醒我们的一样，人能够创造历史，但在他们能够自己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不如此作为。

为了寻找类似的具有创造性、破坏力、意外性的以及超乎计划之外的领导才能，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普鲁士以及后来德国的首相奥托·

冯·俾斯麦，那位1871年德国统一的策划者。

乍一看，这种比较也许很奇怪，甚至不合情理。俾斯麦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而布莱尔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俾斯麦视自己为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一个纯粹的“时间溪流中的航行者”；而布莱尔则把自己看作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喜欢尽其所能超越局限。俾斯麦是一位进行政治活动的自觉传道者；而布莱尔则是国际社会教条主义的化身，正是受这些教条主义的影响，国际社会才被迫不断地卷入人道主义的干涉中，即使这与其他国家的主权相冲突。

但就领导能力而言，两者之间的比较是令人颇感兴趣的。两个人都超越了他们的本源。俾斯麦从一个普鲁士贵族狭隘利益的守护者，转变为民族自由主义的英雄，这意味着他曾经发誓捍卫的普鲁士王国的灭亡。同样，布莱尔也远离了他作为裁减核武器拥护者的根基，而成为不断摇摆的“解除伊拉克武装”同盟的关键人物。

两个人都谋求超越党派隔阂的支持。他们都声称要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而这也并非是绝不可信的。然而，只是两者都从未得到他们“核心拥护者”的信任。像许多伟大的领导者一样，两个人都没有循规蹈矩。

两个人都必须应付少数国会议员和公众的反对。在德国统一之前，俾斯麦备受普鲁士州议会占多数席位的自由党的排挤，他们拒绝通过他的预算方案。同样，布莱尔遭到了来自议会的关于伊拉克战争合理性和道义上的质疑，并且更多的反对声音来自于国内问题，尤其是在公众极为关注的问题上，如以救世主自居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以及随之带来的税收和大学收费等问题。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致力于伟大的一体化工程。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也许他的初衷并非如此；布莱尔企图引领21世纪初期欧洲的雄心壮志，这两点十分相似。因为，现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与1860年德国统一前的状况基本类似。

自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以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就在快速地推进，但是政治的统一却遭到了抵制，比如那些不愿放弃独立的日耳曼小国家，尤其是奥地利不愿受普鲁士



俾斯麦，19世纪普鲁士宰相，有“铁血宰相”之称。他于19世纪中期领导并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